

国家图书馆藏袁廷桢题跋考释

刘 鹏

袁廷桢(1764-1810),后更名廷寿,字寿阶,又作授阶、绶阶、寿皆、绶皆等,号又恺(又凯),吴县(今苏州吴县)人。清乾嘉间苏州著名藏书家,与黄丕烈、顾之逵、周锡瓚并称“藏书四友”、“乾嘉四大藏书家”。同时,他还是黄丕烈的亲家,袁氏子娶了黄氏女,可见“四友”作为藏书家群体的密切关系。

袁氏家资殷富,而他本人则不事生产,不求功名,专意藏书,生前所蓄宋槧明抄及金石碑刻,有数万卷之多^①。可是这些善本经籍,却在他身后,骤然而散——顾千里在《月下笛·过袁绶阶旧居有感同戈顺卿赋》中叹道:“试问楼中,身前肯信,破家如此?”^②可知袁家在袁廷桢四十八岁英年早逝之后,必然经历了一场惨变^③。

时至今日,文献记载中袁廷桢自编的《五砚楼书目》、《金石书画所见记》等藏书目录性质的著作,难觅其踪。而关于袁氏家世、藏书、抄书(贞节堂抄本)、刻书、交游等诸多问题,目前都没有深入的研究。这一点,藏书四友中除黄丕烈外的顾、周、袁三人,情况都十分类似。本文拟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数种袁廷桢题跋加以整理,并作考释,以期关于“藏书四友”、顾千里等藏书家和学者的研究提供更多的一手文献。

一、《说文解字》十五卷〔汉〕许慎撰 清初毛氏汲古阁刻本
佚名校 袁廷桢跋 索书号 7316

此《说文解字》乃汲古阁初修印本,同小读书堆所藏者。较未修初印本已逊,然比时俗印本远胜也。顾君千里知予重出,以所校《荀子》易去。时嘉庆戊午季秋既望,袁廷桢记。(书末)

此跋作于嘉庆三年(戊午,1798)九月十六日,跋中“小读书堆”为顾之逵

①丁子复《袁君寿阶像赞》云:“汝南六俊,四皇甫匹。越三百年,得君而七。万卷手批,三物躬飭。用敦薄夫,惠风遥集。”(《红蕙山房吟稿》,清乾隆知不足斋丛书本)

②顾广圻:《顾千里集》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69页。

③郑伟章:《文献家通考》,中华书局,1999年,第553-554页。

(1752-1797)^①书斋名。就在嘉庆二年,侨居苏州,为“说文学”大家的段玉裁,据历年所见的《说文解字》版本,包括王昶^②家藏宋刊本,周锡瓚所藏宋刊本、明叶树廉抄宋本、明赵均抄宋大字本、有毛扆批校的汲古阁初印本等,作《汲古阁〈说文〉订》,并在序言中明确指出,汲古阁印本《说文解字》,所据为宋小字本,又参以赵均抄本,“四次以前微有校改”,至第五次则根据已失去小徐(徐锴)真面目的《说文系传》,“校改特多”,并成为后来极为通行的版本(即所谓剗改本),致使谬种流传^③。而据段氏序文自述,《汲古阁〈说文〉订》的成书,既有赖于周锡瓚的“多藏不吝”,又多蒙袁廷椿的“助予翻阅”。

根据袁跋,国图藏此书为毛氏前四次修订印本中的一种(顾之逵所藏亦同),虽不及周锡瓚所藏汲古阁初印本,较之“时俗印本”,即通行的第五次剗改本,却已远胜。

另据潘天桢先生《汲古阁本〈说文解字〉的刊印源流》^④一文考证,据《系传》剗改汲古阁印本者,并非毛扆:明清之际,毛晋购得徐铉等校定、南宋初年刻宋元递修本《说文解字》(现藏国图),嫌其字小,于顺治间以大字开雕,未及而卒。康熙四十年起,其子毛扆继承父志,刻竣全书。毛扆于康熙五十二年(1713)卒后,书版售于“祁门马氏在扬州者”(当即马曰琯、马曰璐兄弟),并约于此时遭剗改印行,成为之后一段时间内的通行本。至于剗改者究竟属谁,仍待进一步考定。

书中藏印有“海盐张元济经收”、“涵芬楼”、“涵芬楼藏”等。

二、《班马字类》二卷〔宋〕娄机撰 清马氏丛书楼刻本 佚名^⑤录顾广圻校又录李曾伯补遗 袁廷椿跋 索书号 3648

二月廿五日又恺对勘一过。(卷上第二十六叶)

二月廿六日灯下对勘一过。(卷上第七十叶,后有朱文方印“五砚楼”)

右《班马字类补遗》五卷,我友顾千里从士礼居所藏旧抄本校录。予见而奇之,亟借归,苦适事冗,即早暮有闲,须校《开元占经》,不得校此书。因属塾师褚南崖录之,而予覆勘一过,庶免漏略。班马二史,自宋至今,不止十刻。乌焉之误,不可枚举。得此犹能考见宋刻面目,可不宝贵乎?嘉庆六年三月廿八日,袁廷椿勘毕记于五砚楼。是日从杭州回来,夜雨一灯,

①顾之逵生平事迹,详笔者《清藏书家顾之逵生平考论》(《国家图书馆学刊》2012年第3期)一文。

②据笔者考察所见,王氏与“藏书四友”关系颇为密切。

③段玉裁:《〈汲古阁说文订〉序》,《经韵楼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,第371-373页。

④《北京图书馆馆刊》1997年第2期。

⑤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为“褚南崖录顾广圻校又录李曾伯补遗 袁廷椿跋”,明显受到跋文影响,但此书中之补遗文字,或非褚南崖所录。详跋后论述。

有怀顾千里焉。(书末,后有白文方印“廷椿”、白文方印“袁仲”)

袁跋中三处文字有后人删除标记(三点)，“不可枚举”旁加“日甚一日”四字、“宋刻”旁加“旧本”二字、“顾”字删去。

《班马字类》，又名《史汉字类》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此书“采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所载古字、僻字，以四声部分编次。……而考证训诂，辨别音声，于假借、通用诸字，胪列颇详。……固不失为考古之津梁也”^①，评价颇为不低。该书虽无宋本传世，但据文献记载可知，向有两种分卷形式：一为上下二卷本，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三著录，后世的代表性版本之一即为此清扬州马氏丛书楼刊本；一为五卷本，有明末仿宋刻本（美国国会图书馆藏）、清抄本等。

而跋中所言“《班马字类补遗》”，所指则为《班马字类补遗》五卷，宋李曾伯撰，“其书以娄氏原书列于前，附《补遗》于每韵之后。原注有遗，复补于注下，亦以‘补遗’二字别之”^②。

因跋文中涉及多种《班马字类》、《班马字类补遗》的本子，情况较为复杂，故略据其先后顺序，排比版本，并对彼此关系予以说明。

甲. 影宋抄本《班马字类》五卷（现藏国图，索书号3379），钮树玉、顾千里跋

此当即跋中“士礼居所藏抄本”，因钮树玉跋云：“此本当从宋刊录下，故‘敦’、‘殷’、‘脊’并缺末笔。”这也与袁跋中“得此犹能考见宋刻面目”句相照应。顾千里于道光八年（1828）跋云：“《字类》有繁简二本，此繁本也，翻刻者颇古雅，用较旧钞，仍小小异同。卢抱经尝言：‘不可以有刻本而弃钞本。’此其比矣。”对此旧抄本的珍视，溢于言表。

藏印有：“一云散人”、“喜孙过目”、“铁琴铜剑楼”。知或经黄丕烈、汪喜孙、铁琴铜剑楼递藏。

乙. 抄本《班马字类》五卷附《补遗》一卷（现藏静嘉堂），顾千里校跋

此当为跋中所云“顾千里校录本”，即顾氏校录自士礼居的《班马字类》五卷附《补遗》一卷（甲本），曾入珞宋楼，现藏静嘉堂文库，《静嘉堂秘籍志》卷十六著录：“卷中有‘马玉堂印’（白文）、‘笏斋’（朱文）二方印。卷末有嘉庆壬戌九月顾广圻手跋。”^③此跋《顾千里集》未载，详细内容不得而知，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》云其为顾千里“校识”^④。跋为嘉庆七年（1802）九月作，当是袁廷椿借录归还之后所跋。

藏印有：“马玉堂印”、“笏斋”。经顾千里、马玉堂、陆心源、静嘉堂递藏。

丙. 抄本《班马字类补遗》五卷（现下落不明），褚南崖录顾千里校语，袁廷椿跋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351页。

②瞿镛编纂：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177页。

③《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》，第五册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379页。

④严绍璎著：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》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275页。

此当即袁跋中“右《班马字类补遗》五卷”所指之本。据袁跋,嘉庆六年(1801)二月至三月,袁廷桢自顾千里处借得其校录本(乙本),命塾师褚南崖录顾校于此书上,并亲自覆勘一过。

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著录此本,作“《班马字类补遗》五卷 钞本”(第117页)。又《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》收录上引袁跋“右《班马字类补遗》五卷”一则^①,文字与上引袁跋删改后的情况全同。据袁跋文意,“二月廿五日又恺对勘一过”、“二月廿六日灯下对勘一过”二则原亦当在此本之上,但《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》未收。由于此本今已不知所在,无法覆验。

藏印有:“袁印廷桢”、“五砚主人”、“枫桥五砚楼收藏印”、“海宁陈鱣观”、“铁琴铜剑楼”。此书经袁廷桢、陈鱣、铁琴铜剑楼递藏,现下落不明。

丁. 清马氏丛书楼刻本《班马字类》二卷(现藏国图,索书号3648),佚名录顾广圻校又录李曾伯补遗,袁廷桢跋

此即有上引三则袁跋之本。但跋云“右《班马字类补遗》五卷”云云,与本书书名、作者、卷数均不符。实际上,三跋原应题于抄本《班马字类补遗》五卷(丙本)上,此本中之袁跋,疑为移录。

仔细考察此二卷本《班马字类》,可以看出在过录袁跋之外,还有以五卷《补遗》校、补该书的痕迹。首先,书前以正楷补钞李曾伯“景定甲子长至日”跋文,书中用正楷将《补遗》文字细密抄录在天头及行列之中。其次,顾千里校语则或以正楷注于字后(与《补遗》抄手同);或以浮签附于各叶,字体有行书、正楷二种(与《补遗》抄手不同)。另外,原书上下两卷,校录者则将标题依其声部涂改为五卷:即上卷涂改为第一(平声上)、第二(平声下)、第三(上声)三卷,下卷改为第四(去声)、第五(入声)二卷。

此书虽为过录本,但书中“袁印廷桢”、“五砚主人”、“枫桥五砚楼收藏印”、“海宁陈鱣观”诸印(包括“铁琴铜剑楼”印),与五卷《补遗》本(丙本)完全一致^②。则此二书很有可能当日先后入藏袁氏五砚楼,并同经陈鱣收藏(或经眼)、钤印,之后又同入藏铁琴铜剑楼。只不过此本最终入藏国图,而五卷本《班马字类补遗》(丙本)则下落不明。

鉴于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将此书著录为褚南崖录顾校及李曾伯《补遗》、袁廷桢跋,那么,我们不禁要问:这个过录本上的袁跋,是袁廷桢本人自录吗?顾千里校语,是否仍是褚南崖所录呢?

由于书写此跋所用的小楷笔,或为笔锋细长而硬挺的一类(如“七紫三羊”等兼毫笔),与日常所用的普通毛笔有异,故而虽以馆藏及正式出版物中的多种袁氏批校题跋核对署名等笔迹,仍难以论定,只能说笔意、署名有几分类似,结合钤印情况,可能性很大。但顾校及《补遗》是否为褚南崖所录,则完

^①瞿良士辑:《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年,第24页。

^②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,第178页。需要注意的是,《目录》中过录的丙本印文,虽断句有误,但仔细审查,与国图藏二卷《班马字类》中所钤印文内容完全一致。

全无从核对——褚氏原录的丙本已经不知所踪。

戊. 清马氏丛书楼刻本《班马字类》二卷(现藏常熟市文管会), (题)褚南崖录顾广圻校又录李曾伯补遗, 袁廷桢跋

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中收录的《班马字类》, 有二部均著录为“《班马字类》二卷〔宋〕娄机撰 清马氏丛书楼刻本 褚南崖录顾广圻校又录李曾伯补遗 袁廷桢跋”。国图本(丁本)之外, 有常熟市文管会藏本。关于二本的异同, 冀淑英先生在复沈津先生信中云:“北图《班马字类》袁廷桢跋系真迹, 此书铁琴铜剑楼旧藏, 与常熟文管会本, 看来的是‘双胞胎’。北图藏本袁跋八行, 与常熟本字迹、内容全同, 所写位置亦同; 北图本袁跋有改字, 常熟本悉依改处照写。”^①冀先生断二书为袁氏笔迹, 自有所据, 但可以肯定的是, 二书均为《补遗》本的二次过录本。此本因未见原书, 难知其收藏序列。

己. 抄本《班马字类补遗》五卷(现藏国图, 索书号 7981), 王振声、赵不騫跋

卷五末有王跋云:“咸丰甲寅仲秋, 以五研楼原本勘过。”所谓原本, 当指袁廷桢所跋抄本《班马字类补遗》五卷(丙本)。王跋作于咸丰四年(1854)八月, 因其为常熟人, 故“五研楼原本”当借自铁琴铜剑楼。跋云“五研楼原本”, 似乎王氏是知道还有其他过录本的, 甚至过录袁跋的清刻本《班马字类》二卷(丁本)当时就在铁琴铜剑楼也未可知。

藏印有:“旧山楼”、“非昔珍秘”、“赵氏秘籍”、“赵印不騫”、“双钟精舍”、“师匡秘籍”、“师匡藏书”、“曾在孙师匡处”、“佛陀所藏书画金石”。可知经赵宗建、赵不騫、孙鼎递藏, 今归国家图书馆。

在梳理了相关的六种书籍之后, 我们大致将与这三则袁跋有关的事件描述如下: 约嘉庆六年(1801)初, 顾千里自黄丕烈处借得影宋钞本《班马字类》五卷(甲本), 校录于抄本《班马字类》五卷附《补遗》一卷(乙本)上。嘉庆六年二、三月间, 袁廷桢借得顾校本(乙本), 命塾师褚南崖录顾校于抄本《班马字类补遗》五卷(丙本)上, 并亲自覆勘题跋。之后袁跋及褚氏所录之顾校, 以及李曾伯《补遗》的内容, 又被分别过录到两种清马氏丛书楼刻本《班马字类》二卷(丁、戊)上。咸丰四年(1854), 王振声复以袁跋抄本《班马字类补遗》五卷(丙本)校抄本《班马字类补遗》五卷(己本)。

三、《水经注笺》四十卷(存十六卷)〔明〕朱谋瑋撰 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本 孙潜跋并过录赵琦美跋、袁廷桢、贝墉跋 赵光照观款 索书号 2537

廿二日以钞本校第四第五卷。五砚主人(卷五后)

廿四日以钞本校九卷十卷。绶阶。(卷十后)

九月廿五日以钞本校十一至十三卷。又恺。(卷十三后)

^①冀淑英著:《冀淑英文集》,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 2004年, 第432页。

廿六日以钞本校十四卷、十五卷。绶阶。(卷十五后)

十月初四日灯下,以钞本校卅六至卅八卷。五砚主人。(卷三十八后)

初五日灯下,以抄本校卅九、四十卷毕。廷桢。(卷四十后)

案朱笺所引宋钞本、旧本、古本往往与据校之旧钞本同,则为影宋钞无疑矣。然乌焉满目,而精善处亦不少,今不别是非,悉著之,以俟考定。旧钞本从顾氏小读书堆所借也。又恺记。(卷四十后)

初六、初七日又覆勘一过。(卷四十后)

此书洞蕢得于扬州,今归与我。乙丑九月望廷寿记。(卷四十后)

《水经注笺》为明朱谋埠以万历十三年(1585)吴琯刻本为底本,以宋钞本及他本参校并笺而成。国图藏此书现存一至五、九至十六、三十八至四十共十六卷,或为祝融之余烬。胡适先生云:“孙潜此本用朱笔校录赵琦美、柳金两本的异文在朱谋埠《水经注笺》之上。每卷之末,孙潜自记他校赵琦美本的年月日,又他校柳金钞本的年月日。他又过录了赵琦美在每卷之末的校书题记。”^①

本书袁氏跋文,均作于嘉庆十年(乙丑,1805)九、十月间。本年八月,顾千里自扬州归苏州^②,并将是书归于袁廷桢。袁氏遂以顾之逵所藏“影宋钞本”校之,用藤黄(据胡适文所载)将异文记于此本之上。这部影宋钞本,目前各家书目都无著录,而国图所藏的明抄本《水经注》上,却有袁氏于本年九月借校的记录。那么,“影宋钞本”与“明抄本”是何种关系呢?

《水经注笺》卷一天头上写道:“钞本每半页十一行,行二十字。”这里所指抄本,即为袁跋中所云顾之逵“影宋抄本”、“旧抄本”,与明抄本行款相较,可知明抄本即顾之逵藏本(参见下文)。

书中藏印有:“九墨舛藏”、“孙潜之印”、“潜夫”、“袁又恺藏书”、“五砚主人”、“枫桥五砚楼藏书印”、“廷桢手模”、“贝塘所藏”、“顾洞蕢藏书”、“古吴潘念慈收藏印记”、“潘印念慈”、“潘印介祉”、“古吴潘介祉叔润氏收藏印记”、“玉笋”、“叔润藏书”、“潘叔润图书记”、“藕花香榭收藏印记”、“傅印增湘”、“江安傅氏藏园鉴定书籍之记”、“藏园”、“双鉴楼珍藏印”、“企驎轩”、“忠谟继鉴”、“晋生心赏”。

四、《水经注》四十卷〔汉〕桑钦著〔北魏〕酈道元注 明抄本

何焯、顾广圻校 袁廷桢跋 索书号 2754

嘉庆乙丑九月借校,因正错简脱失。廷寿。(卷四十末,后有朱文长印“袁又恺借校过”)

由上文考证可知,此书即袁廷桢所谓的顾氏“影宋抄本”。抄本字迹流畅,字体不一,大约“影宋”的重点在行款而非字迹。《水经注笺》卷一天头上云

①胡适:《记孙潜过录的柳金〈水经注〉钞本与赵琦美三校〈水经注〉本并记此本上的袁廷桢校记》,《胡适全集》卷十六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3年,第392页。

②李庆著:《顾千里年谱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,第105页。

“钞本(按即此本)每半页十一行,行二十字”,实际上此本绝大多数情况半叶十一行,行二十字,字数偶有增减。书末有袁廷桢手模的宋元祐刻本完整题记:

右《水经》,旧有三十卷,刊于成都府学官。

元祐二年春,运判孙公始得善本于何圣从家,以旧编校之,才载其三分之一耳。于是乃与运使晏公委官校正,削其重复,正其讹谬。有不可考者,以传疑焉。用公布募工镂板,完缺补漏,比旧本凡益编一十有三,共成四十卷,分二十册。其篇秩小大,次第序先后,咸以何氏本为正。元祐二年八月初一日记。

◎涪州司户参军充成都府府学教授彭戢校勘

◎朝奉大夫充成都府转运判官上护军赐绯鱼袋孙□

◎朝议大夫充成都府路转运副使兼劝农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晏知止

后有朱文印“廷桢手模”。胡适先生说:“袁氏的校记有最重要的《水经注》版本史料,沉叔与静安诸先生都不曾注意,我要特别保存在这里。……这个顾之逵本的特别贡献是,此本尾页保存了北宋元祐二年(1078)成都官刻本的后记与题名的全文,可以考正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所载陆孟龟钞宋刻本的题跋的脱误,可以使我们明了《水经注》在元祐初刻前后的历史。……这是很精细的手模本,其中如‘篇秩’,如‘成以’,钞本错误显然,但袁氏都照模不改正。”^①《水经注》宋刻本,在清代藏书家目录中并无著录(黄丕烈也仅收藏一部明刻本),现存已知者也只有内阁大库旧藏、现藏国家图书馆的十二卷残本(索书号5237),傅增湘先生据避讳字及刻板风格断为南宋初刻本^②,也有学者断为北宋刻南宋修刻本^③。所以,袁廷桢据以“手模”的、有北宋哲宗元祐年号的原本,情况如何,恐怕目前难以确知,只能留待进一步考察。

跋文中“错简”云云,正是《水经注》在那个时代经、注错讹的写照。《水经注笺》的作者朱谋瑋也在序言中说:“知《水经》一注,撮彼二百四十四家菁英居多,岂不诚为六朝异书哉!顾传写既久,错简讹字,交棘口吻,至不可读,余甚病焉。”

书中藏印有:“语古”、“稽瑞楼”、“何印寿仁”、“吴郡沈文”、“辨之印”、“翁印同龢”、“翁斌孙印”、“文端公遗书”、“越溪草堂”。

五、《战国策》三十三卷〔汉〕高诱注〔宋〕姚宏校正 宋绍兴刻本 黄丕烈、顾广圻跋并题诗 钮树玉、袁廷桢、夏文焘题诗 索书号 8668

书付无双士,图归五砚楼。良朋多作合,卒岁亦无愁。不惜饼金掷,惟欣秘笈收。今来观跋尾,题句胜清游。重“无”字,以“可消”易“亦无”。

①胡适:《记孙潜过录的柳金〈水经注〉钞本与赵琦美三校〈水经注〉本并记此本上的袁廷桢校记》。

②傅增湘:《宋刊残本〈水经注〉书后》,《藏园群书题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,第234-238页。

③陈桥驿:《〈水经注〉版本和校勘的研究》,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》2000年第1期。

己未仲春,访堯圃二兄于士礼居,重观所得宋刊《战国策》,次非石题句韵请正。去腊君得此书由余,而余得南田画册由君,故诗中及之。渔隐主人袁廷桢拜稿。

宋高宗绍兴十六年(1146),姚宏依据汉高诱注本《战国策》,荟萃诸本,续加校注,刊行于世,姚宏校正本,有明确记录的宋刻有两种,即所谓梁溪高氏本与梁溪安氏本。明末天启年间钱谦益以重金相继购得两本。其中梁溪安氏本后为钱曾购得,载于《读书敏求记》中。此后直到嘉庆初年,这两部宋刻人间罕见,“四友”中只有顾之逵藏有一部安氏影宋抄本^①。而国图所藏这部梁溪高氏宋刻本,于嘉庆三年为黄丕烈所得,于嘉庆八年影刻,并融汇姚、鲍(彪)两种版本之长,成为清中期以来最好的本子。从书中众多的题跋与题诗可知,袁廷桢对于此书入藏士礼居,有功在焉。

原来,这部梁溪高氏宋本《战国策》,在入藏士礼居之前,先为苏州人毛榕坪所得,后为其亲金德舆^②“豪夺”而去。而黄丕烈与金德舆,虽久有往还,此前却因某次借书之事互存芥蒂,所以金德舆托鲍廷博出售宋本《战国策》之时,曾特意嘱托“可归袁,勿归黄”。此后,有赖于袁廷桢、钮树玉、鲍廷博的从中斡旋,黄丕烈终于以银八十两的高价,于嘉庆三年戊午(1898)十二月十五日将此书购入士礼居。而稍后袁氏得《南田画册》,又得力于黄丕烈的帮助。所以袁跋中才有“书付无双士,图归五砚楼”、“去腊君得此书由余,而余得南田画册由君”之语。所谓《南田画册》,当指清初著名画家恽寿平^③的画册。据《匪石日记钞》,本年十二月二十二日,钮树玉访黄丕烈,曾见“恽格(寿平)小幅山水,笔墨精绝。……传言出自经训堂”^④,可知袁氏得画册,确与堯圃有关。

六、《战国策》三十三卷 乾隆二十一年卢见曾雅雨堂丛书本 袁廷桢跋并临惠士奇批校、顾广圻校 索书号 2749

乾隆乙卯六月下旬临惠氏半农^⑤阅本。廷桢。(卷三十三后。后有朱文圆印“袁”)

①黄丕烈著:《堯圃藏书题识》,上海远东出版社,1999年,第106页。此书现藏山东图书馆,据书中黄、顾跋文,可知其与黄丕烈所得宋梁溪高氏本不同,为安氏本的影抄本。

②金德舆(1750-1800),字鹤年,号云庄,又号鄂岩、少权,桐乡(今浙江桐乡)人。监生,官刑部主事。善书,七岁能诗。喜藏书,精鉴赏。著有《桐华馆诗钞》,校正《东观汉记》诸书八种,名曰《史翼》。室名“桐华馆”、“华及堂”。

③恽寿平(1633-1690),初名格,字寿平,后以字行,又字正叔,号南田,别号云溪外史等。武进人。“清初六家”之一,时称诗书画“三绝”。初善山水,后舍而学花竹、禽虫,斟酌古今,一洗时习,独开生面,海内宗之,有常州派之称。

④钮树玉著:《匪石日记钞》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,商务印书馆,1939年,第11页。

⑤惠士奇(1671-1741),字天牧,又字仲孺,号半农,学者称红豆先生,吴县人。惠周惕子,惠栋父。盛年兼治经史,晚尤邃于经学。撰有《易说》、《礼说》、《春秋说》等。

嘉庆庚申九月，借士礼居顾千里校宋本照校，亦以丹墨分别影抄，与宋槧十三日校毕。廷桢记。（前跋之后。后有朱文方印“引生”）

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，卢见曾据绛云楼旧藏宋本（汉高诱注、宋姚宏校正），刊刻了《战国策》三十三卷本，此即雅雨堂本，是乾嘉间高注《战国策》的通行本。

早在乾隆六十年（乙卯，1795）六月，袁廷桢便将惠士奇批校过录于此本之上。约嘉庆初年，顾千里曾以十卷的鲍彪注、元吴师道补正本《战国策》校雅雨堂本。嘉庆二年（1797）夏，又以顾之逵藏影宋本校雅雨堂本。嘉庆三年（1798）十二月黄丕烈得宋梁溪高氏刻本，顾千里遂于次年二月以之校雅雨堂本。嘉庆五年庚申（1800）九月，袁廷桢将萃集吴师道本、影宋本、宋本精华的顾千里校本借来，并“影钞”其校语于此雅雨堂本之上。天头上有“广圻按”云云者为临顾校，无者为临惠校。顾校原为朱墨两色，大致校影宋本及吴师道本用朱笔，校宋本用墨笔，故袁廷桢亦以两色“影钞”。

此本书前还有袁廷桢过录顾广圻题识，因与袁廷桢过录惠、顾校语以校雅雨堂本的行为关系密切，故亦附于此：

此书曾晦于世，得雅雨刻之而复显，好古之士咸重之。乃予取验吴师道《驳正》所称元作某某者，颇有不合；而于改为某某者，反有合焉。深不解其故。丁巳夏，得影宋抄本一校。今年春，得宋槧本再校，乃知与吴祖骅者，大率文不可读，则参取以润色之，出雅雨堂刻是书时之所为也。其传古书而不传古书之真，尚得谓之能传古书乎？虽谓显而仍晦可也。今悉复其旧，以为菟圃所藏宋槧之副。期广与好古之士共之，若云必留此不可读者，为佞宋之病，则请用《驳正》比而细读之，当知其不然也。嘉庆己未二月顾广圻记。九月借校并录。廷桢。

顾千里校本（雅雨堂本），此后下落成谜。李庆先生认为此书“已不见著录”、“原书待考”^①。2010年12月，此书惊现于西泠拍卖会，并拍出了800.8万的高价。根据相关新闻及拍卖记录，可知书上仅有“思适斋”、“顾澂齋手校”两印，并有朱墨“嘉庆八年黄尧圃重刻此书为之校讎”、“嘉庆二年四月，顾广圻校”等题识。上文所引袁廷桢过录之顾千里长跋，在拍卖图录等相关介绍中并未提及，或者已于流传过程中失去。又此跋未见于《顾千里集》、《思适斋书跋》，且跋文对流行一时的雅雨堂刻本“传古书而不传古书之真”提出了中肯的批评，值得重视。

书中藏印有：“五砚楼”、“廷桢校读”、“袁绶阶”、“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监我”、“陈仲鱼家图书”、“简庄艺文”、“鱣读”。

七、《管子注》二十四卷〔唐〕房玄龄撰 明万历十年刻本

袁廷桢、顾千里、莫棠、佚名跋 索书号 14860

嘉庆七年二月，借士礼居原本覆校一过。寿阶。（二十四卷后。后有朱文

^①《顾千里研究》，第337页。

长印“枫桥五砚楼收藏印”)

宋本“處”作“处”，“與”作“与”，“無”作“无”，“後”作“后”，“萬”作“万”，“禮”作“礼”，“錢”作“钱”，通书如此，未及尽改。(二十四卷后。后有白文方印“廷樗之印”)

这部万历十年的《管子注》，实际上就是赵用贤所刊《管韩合刻》本的一部分，九行十九字，白口，四周单边。赵氏刻《管子》，依据宋本校正文意，参考明初刘绩《管子补注》本，章目分合重加厘定，缺失的页码文字予以补正，十分精良。后来诸刻无不脱胎于此^①，也是《管子》一书版本演变过程中最主要的环节^②。

宋刻本《管子》，有两部曾为黄丕烈收藏。一部是赵用贤本所依据的底本，即南宋初年张嶠据北宋杨忱刊本校订的宋刻浙本^③（现藏国图，索书号 9601）。这部唯一存世的宋本，明代以后的递藏序列，大致为文征明-文伯仁-徐乾学-黄丕烈-汪士钟-铁琴铜剑楼-国家图书馆^④。另外一部，是南宋瞿源蔡潜道宅墨宝堂刻本（缺卷十三至十九）^⑤。此书对杨忱刊本有修订，与浙刻本微异，其清代以来可考的递藏序列，大致为顾竹君-顾氏后人-黄丕烈-汪士钟-海源阁-天津，目前下落不明^⑥。

那么，袁跋中所云嘉庆七年二月所借“士礼居原本”究竟为何呢？我们可以从黄丕烈题跋中，窥见端倪。浙刻本为黄丕烈所藏的时间，在嘉庆九年甲子，得自北京^⑦。袁廷樗自然无法在两年前提借此书。墨宝堂本为黄氏所藏的时间，在嘉庆二十二年丁丑^⑧，距袁氏借书时间，相距更远。但是约于嘉庆初年，黄丕烈曾借校此书（“二十年前曾借校之”），或者于嘉庆七年左右亦曾借校。本书卷首抄录牌记“瞿源蔡潜道宅墨宝堂新雕印”，卷尾抄录“瞿源蔡潜道宅板行，绍兴壬申孟春朔题”。又有顾千里跋云：“宋槧本校一过，其第十三至第十九，凡缺七卷。润贲。”综合推断，所谓“士礼居原本”，当为墨宝堂本。

①池万兴著：《〈管子〉研究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72页。

②郭丽：《赵用贤本〈管子〉论略》，《管子学刊》2007年第2期。

③北宋庆历四年（1044），杨忱刻《管子》，至南宋绍兴九年（1139），张嶠对杨书进行了抄校。据版心刻工姓名等因素判断，此书于南宋初年刊刻，保留杨氏原序，并附张氏《读〈管子〉》一篇于书后。

④郭丽：《国家图书馆藏南宋浙本〈管子〉考略》，《图书情报工作》2009年第23期。

⑤郭丽：《南宋墨宝堂本〈管子〉考略》，《图书馆杂志》2010年第11期。

⑥丁卯（1927）十月廿九日，傅增湘曾于天津见此书，索价四千元（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571页）。此后诸家便无著录。

⑦黄丕烈跋称：“甲子岁，余友陶蕴辉鬻书于都门，得大宋甲申秋杨忱序本，板宽而口黑，亦小字者，因以寄余，索直一百二十金，毫厘不可减。余亦重其代购之意，如数许之，遂得有其全本。”（《菴圃藏书题识》卷四，第252页）

⑧黄丕烈跋曰：“此宋刻《管子》二十四卷，原缺卷第十三至卷第十九，任蒋桥顾竹君藏书也。二十年前曾借校之……近日宋槧宋刻子部并归他人，重忆向所未惬意之本，遂从顾氏后人归之……嘉庆丁丑重阳秉烛记。”（《菴圃藏书题识》卷四，第251页）

书中藏印有：“袁又恺藏书”、“廷椿之印”、“廷椿校读”、“莫棠所藏”、“独山莫氏铜井文房藏书印”、“莫天麟印”、“初照楼”。

**八、《袁氏世范》三卷〔宋〕袁采撰《集事诗鉴》一卷〔宋〕方昕撰 宋刻本
韩应陞袁表、袁褰、袁廷椿跋并跋 索书号 8685**

宋三衢袁君采著《袁氏世范》，见《唐宋丛书》及《眉公秘籍》，陈榕门先生复采入《训俗遗规》，然皆非足本。乙巳春，予于书肆检阅旧编，得此宋本书，分三卷，后附方景明《诗鉴》一卷，有予从祖陶斋公、谢湖公二跋，称其校刻精善，洵为世宝。是吾家故物也，楚弓楚得，若有冥贻。谨读数过，其言约而赅，淡而旨，殆昌黎所谓“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”者耶？予方刻载家谱，鲍丈以文见而赏之，复梓入丛书，附《颜氏家训》后，以广其传。是作者书者幸甚，而予之购得此书亦幸甚。乾隆庚戌孟冬古吴袁廷椿跋。（书末）

据韩应陞跋文“右三袁跋，照鲍刊《世范》本录。原墨迹盖即在此本《三春》后末叶。后幅纸割去者亦是也。其割去盖在袁又恺廷椿家散出时”可知，此书末原有袁表、袁褰、袁廷椿跋，而为书贾割去，此跋为韩应陞照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《袁氏世范》移录。书得于乾隆五十年（乙巳，1785）春，原题于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十月。但据韩应陞跋，可知鲍廷博本对宋本亦有擅改之处。此书对于袁廷椿，有特殊的意义，是所谓“吾家故物”，他将其交付鲍廷博刊印，可见对鲍氏的信任和两人的交情。这样，袁氏卒后，其《红蕙山房吟稿》列入《知不足斋丛书》第二十八集刊印出版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书中藏印有：“宋京西提刑十七世孙袁惟聃字寿祺”、“惟聃之印”、“袁褰印”、“袁褰私印”、“袁表印”、“袁昶”、“勋和”、“休复堂印”、“价藩”、“松江读有用书斋金山守山阁两后人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之印”、“德均审定”、“韩印绳文”、“春谷”、“春谷草堂”、“子子子孙永保之”、“访雪斋印”、“袁家固当有人”、“密均楼”等。

**九、《楚辞章句》十七卷〔汉〕王逸撰 明正德十三年黄省曾高第刻本
袁廷椿校并跋 索书号 2731**

丙寅七月九日甲寅以宋本校起。五砚主人。（目录下）

嘉庆十一年初秋，借黄莞翁新得宋槧王逸注《楚辞》校此本，原缺七卷第六、第十至十五，以《补注》本配入，亦宋槧也。别校于汲古阁翻雕本上，后有《释音》一卷，《广骚》一卷，则各本所无。手自影钞，附装于后。廿七日壬申勘毕，袁廷椿记于五砚楼。（卷十七末）

上录二跋题于嘉庆十一年丙寅七月九日至二十七日。跋中所云“黄莞翁新得宋槧王逸注《楚辞》”，即汉代王逸所著《楚辞章句》（十七卷本）。跋云“原缺七卷”，而袁跋明本卷六、卷十至卷十五各卷首页，均有袁氏注“宋本缺此

卷”，前后可以印证。《楚辞章句》宋本已不存世，现存版本以此袁廷桢所跋明正德黄省曾本为最早。

袁氏所云用以补残宋槧王逸本的“宋槧《补注》本”，当为宋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（含王逸《章句》）。宋槧本现已不存^①。

跋中所云“汲古阁翻雕本”，指康熙元年（1662）毛氏汲古阁根据宋本重刻的《楚辞》十七卷（王逸章句，洪兴祖补注）。

袁廷桢跋中涉及的两种宋本，虽然目前都已不存，但都指向黄丕烈士礼居。检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及《标点善本题跋集录》中黄跋，均无一语涉及二书。但细读顾千里《百宋一廛赋》，可以从黄氏自注中窥得其迹：“驰香严与芳菽，思计日而取俊”句下，注云：“居士既成此赋，予旋得《御览》矣。又别得……残本王逸注《楚辞》。”^②据黄氏自云，其得残宋本《太平御览》于周锡瓚处，在嘉庆九年甲子（1804）冬^③，注文云“又别得”残宋本《楚辞章句》，而《百宋一廛赋》注文完成于嘉庆十年乙丑（1805）秋^④，可知其书入藏士礼居，正在此期间。

书中藏印有“稽瑞楼”。

袁氏藏书之名，盛于一时。从整理情况来看，国图藏袁氏题跋善本九种，却多为明清抄刻本^⑤。这与顾之逵题跋批校本的版本情况非常相近。结合顾之逵生前对写作藏书志“徘徊矜慎”^⑥的态度，两人对宋元善本的珍视，以及“不轻易在宋元善本上题跋”的谨慎心态，十分类似。而袁、顾绝少宋元善本题跋的事实，应当也与两人均年未及五旬便骤然而逝，有许多心愿未竟有关。但另一方面，这些题在明清刻本之上的跋语，却与许多存世或久佚的宋刻本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，未可等闲视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国家图书馆

①崔富章：《〈楚辞〉版本源流考索——兼及〈楚辞要籍解題〉之讹误》，《浙江学刊》1987年第1期；崔富章：《楚辞书录解題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0年。

②《顾千里集》，第22页。

③《尧圃藏书题识》：“《太平御览》为类书渊藪……周君锡瓚家有宋刻残本……岁甲子冬，议直二百四十金，以余所藏他宋刻书抵其半，酬介者以十金，此书遂归余。”（第405页）

④《顾千里集》，第24页。

⑤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袁氏题跋善本三种，情况亦同。详《标点善本题跋集录》，中央图书馆，1992年。

⑥顾千里《爱日精庐藏书志序》云：“予又念抱冲之存，尝为《读书志》，徘徊矜慎，迄未具稿。”（《顾千里集》，第191页）